

汉画像石中骆驼形象图式浅析

文 · 中国矿业大学 · 张红江 · 曹家昌

[内容摘要] 汉画像石中的骆驼不仅表现汉代人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更体现出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融。骆驼形象作为汉画像石中的图像，映射出汉人的审美特质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 画像石 骆驼形象 文化内涵

汉画像石是目前研究汉画艺术最全面、直观的宝贵资源，被冯其庸先生誉为“敦煌前的敦煌”，研究价值得到重视。骆驼的艺术形象虽然不像晋唐时期大量地出现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中，但已陆续地在汉画像石中被发现。

一、骆驼形象的产生

据笔者考证，目前国内汉画像石出土资料显示，刻画有骆驼形象的汉画像石至少有二十余块，作为新式图样在汉代中原地区的引入，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陕西等地方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出现了形态各异的骆驼形象，这反映了自张骞开拓丝绸之路后，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孕育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骆驼不仅是胡汉相争的战时工具，更是贸易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带动了文化上的交融并蓄。

汉代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大融合的前奏，通过“丝绸之路”同周边民族与国外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代艺术融汇八方，群英荟萃。而骆驼则承载了“丝绸之路”的开通，驼铃声声，出现在荒凉的沙漠中。骆驼形象在汉画像石中的出现，体现了当时工匠对西域“异兽”的初步认知，骆驼造型一般以单个出现，有时与胡人、大象一起出现。在徐州汉画像石馆中就有一块《胡人骑骆驼》（图1），石头是石阙的基座，高80厘米、宽85厘米、厚92厘米。由两块巨石组成，画面分为三面三层：正面上层刻人物恭迎车马；中间刻菱形纹；下层刻四人骑骆驼和翼虎。左侧面刻车马出行和辎车。右侧面刻人物、异兽、珍禽、游鱼。汉画像石中，恭迎马车队中出现骆驼，就意味着从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带来贵重的货物。在汉代“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①的厚葬之风影响下，异域奇货及异兽都是墓主财富的象征，在四川新都墓出



图1 胡人骑骆驼

土的骆驼载乐中，画像砖刻画乐人在驼上击鼓的生动场面，反映了雇主想把人间欢愉带入仙界的美好愿望。

在汉代，骆驼不仅用于商业活动，还在战争中充当了军事物资的运载工具，《汉书·轮台诏》中汉武帝讲汉伐大宛国：“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②两汉时期，汉人与胡人的交战不在少数，腿长的骆驼虽然不善于奔跑，但是持久力较强，所以经常作为沙漠战争中帮助运载的工具。山东地区孝堂山石祠中反映胡汉战争题材的画像石中出现了骆驼载人的画面，也印证了骆驼作为军需工具的史实。

汉代的经济贸易交流离不开骆驼，骆驼也为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滕州市汉画像石馆收藏的《骆驼、牛车、僧侣图》中牛车上坐着五个光头胡僧，说明来自西域的佛教活动已开始渐入中原。

二、汉画像石骆驼的造型分析

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术特点大致分文平面阴线刻、剔地浅浮雕平面阴线刻、剔地弧面浅浮雕、剔地高浮雕四种。从西汉至东汉，



图2 迎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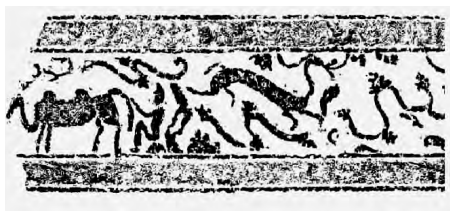


图3 骆驼、胡人图

工匠的雕刻技术日臻成熟。骆驼形象的造型特点因时代、地域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造型特征，但整体上表现出汉代艺术气势雄浑、浑厚朴实、古拙狂放的审美趣味，虽不事细节，却有浑然天成的整体力量和气势。骆驼造型或动或静，处处彰显出汉代审美中热情奔放、胸怀开阔、海纳百川的特质。骆驼造型强调线性轮廓的整体特征，多取骆驼侧面形态构图，以线带面、交线成点是其造型语言的基本手段。线条自身的表现力构成了东方艺术的特殊文脉，在汉画像石中可见端倪。例如，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画像石《迎宾图》（图2），雕刻手法为剔地弧面浅浮雕，画面上格刻鹿、狼等兽和云气纹；中格刻七人，全部向左，其中一人抱琴；下格刻一尖帽胡人骑于骆驼之上向左徐行，后面跟着一头大象。画面中的骆驼造型质朴、写实，脖子粗而长，弯曲如U状，身体硕大。浅浮雕的雕刻手法把骆驼造型的轮廓线更加凸显出来，自然流畅，一气呵成，骆驼变得更有立体感和概括性。胡人牵拽骆驼，骆驼张嘴嘶鸣、微蹲欲进、颈部扭曲的态

势选择将其体形硕大且沉重有力的特点表现得异常生动。

汉画像石中,造型特征具有较强的线性特点。明代邹德中的《绘事指蒙》将十八描总结分类,十八描是用来体现情感和整幅画面的气氛的。中国画早期比较成熟的描法是高古游丝描,是之后各种线描的源头。高古游丝描的代表人物是顾恺之,它的雏形源于战国帛画,在汉代画像石中更有充分的体现。清代叶德辉评价顾恺之的人物画“犹存汉石室石阙画像遗意”。李保恂也称顾恺之的画“古朴浑论,类似画石”。^③汉画像石中的线性表现力是后人绘画语言重要的来源。在《骆驼、胡人图》(图3)中的骆驼又区别于其他画像石中的骆驼,造型特征更多地被凝练成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线条的变化。身躯的粗壮、尾巴的纤细、前腿的笔直、脖子的弯曲,静中有动,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效果。骆驼身上的细线有规律地排列,组织关系不同,毛发的方向也就不同。汉画像石注重整体神韵的表现,而往往较粗的线条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出一种力量美、装饰美。

隶书在汉代逐渐演变成成熟,隶书作为汉代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汉画像石的造型似有共通之处。汉画像石中骆驼的躯体、四肢、尾巴等粗细甚显,“笔触”刚劲、流畅而且圆润,从形态来看,汉隶的灵韵油然而生。画面充实饱满,大方简约。汉隶的“一波三折”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是汉代人用不同手段所展现出的古拙美。徐州茅村汉墓画像石《骆驼、大象、瑞兽图》(图4)中画面从左至右依次为骆驼、大象、九头怪、双凤、凤、树、羽人、马、白虎、鸟等。骆驼上坐一胡人,大象上有一象奴。画面整体采用中间对称的规则性平铺方法,疏密得当,画像石中的骆驼采用二分之一正侧面的惯用构图,头颈之间的粗细弯曲不一,躯体更加丰满,纤细的四肢,这之间既有对比又协调。画面利落明净、精练概括,形象灵动活跃,生趣盎然。充分体现了汉画像石的匠师们对画面整体的把握能力及创造力。

多数有骆驼造型的画像石出土于山东省,虽然骆驼数量不多,但是造型都趋于写实,所有画像石上的骆驼无论单峰双峰,都不会过于凸显。每个地方出土的骆驼都形神兼备又有不同之处。地域原因虽有,但是在同一地区出土的骆驼造型也很不同,所以很难从地域来划分造型的不同。目前从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出,山东济宁邹城的骆驼相对纤



图4-骆驼、大象、瑞兽图

细,没有骆驼本身的沉重感,脖子有U形也有伸直的造型,较其他地区,邹城的骆驼写实性显弱,轮廓线单一。而徐州地区的骆驼身体宽厚、沉重,写实性强,骆驼形象粗犷,刻画简练。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迎宾图》中,画面骆驼虽雕刻手法略显稚拙,但造型生动,较粗的线条更显得质朴。一些直观上的造型差异更多地体现在不同的题材中,如若出现在“现实”的世界,造型会更加生动写实;若出现在有神兽的画面中,必定会更加神性化,装饰性更强。邹城西南石墙公社驻地发现的一块《骆驼、胡人图》(图3),其中骆驼的造型显得较灵活,四肢纤细,脖子尾巴弯曲,雕刻的直线与曲线相互结合,线性元素带来的视觉感受十分强烈,装饰性的线性元素更加突出,并且溢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文化内涵

汉代画像石中运用极其简略概括的造型手段,画面中的骆驼构图较单一,雕刻质朴,透露着汉代浪漫古朴之意,有写实笨拙的骆驼,也有纤细成线、运动感强烈的骆驼。每个地区出土的有骆驼形象的画像石虽然不多,但至少说明骆驼在汉代已经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帮助汉代帝王开疆扩土。

在汉代流行的丧葬习俗中,生养死葬是儿孙孝行的具体体现,谓死如生是其重要观念之一。骆驼造型在汉画像石中,具有引导主人升天的象征意义。汉东方朔在《七谏·乱》中写道:“要褻奔亡兮,腾驾橐驼。”^④死后升仙,在进入昆仑上西王母居所之处,需要交通工具,为了体现这一朴素的信仰,其中之一的办法就是在汉画像石中借助于胡人骑驼、引人升天的题材来表现。胡人骑骆驼被隐喻为升仙的工具。南阳画像石中有一块《仙人骑驼》图,骆驼在画面左边,两驼峰之间坐一胡人,骆驼造型夸张,昂首奋蹄,比喻胡人乘驼,引导升仙。

汉画像石中骆驼常与胡人、大象同时出现,构成了“胡人一骆驼一象”的图像母体,大象形象是中亚贵霜帝国艺术题材中常用图像,这一图像模式随着早期印度佛教文

化开始逐渐传入中土、与儒家、道家文化杂糅相融的重要信息。山东两城山出土的龙、骆驼、象、象奴图中生动体现了中原汉人对早期佛教文化的包容及与本土文化相融的朴素理解。

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胡人习惯生活在广袤的大草原,汉人生活在气候湿润的中原大陆;一个是游牧民族,一个是农耕的生产方式,各种复杂的因素造就了不同文化特征。胡汉之争不可避免,但从冲突到融合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汇是历史的选择。骆驼出现在汉画像石中,说明汉人已经对西域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骆驼在胡汉的文化交融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语

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热闹繁忙的场景虽已成为历史,却启发了如今中国新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的构建及实施。骆驼作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对其在汉画像石中图式的深入研究,具有新时代的重要价值。

项目名称: 本论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8SJD1158。

注释:

- ①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
- ②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2000年版
- ③ 邱瑜玉:《顾恺之与高古游丝描的风格研究》,鄂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 ④ 贾太宏:《楚辞汉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
2. 朱浒:《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上海大学,2012
3. 杨絮飞:《汉画像石造型艺术》,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4. 石云涛:《汉代骆驼的输入及其影响》,历史教学月刊,2016.6
5. 葛承雍:《天马与骆驼——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译》,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1